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的慈善救助活动

何 荣

内容提要：为了扩大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新疆开设了医院、学校、孤儿院等慈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参与了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客观上对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近代的救助理念传入新疆，新疆社会救助呈现出近代化发展趋势；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救助也呈现出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传教士 新疆 宗教慈善救助 天主教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79.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 (2009) 06—0120—07

作者简介：何荣，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13）。

1883~1938年，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传教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到新疆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来自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圣言会，基督教的瑞典传教公会和内地会等教会组织。为了传播宗教，扩大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民众中的影响，传教士通过开设医院、学校、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参与临时性赈济等慈善形式，参与了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活动，客观上对近代新疆的社会救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新疆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①。光绪九年（1883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派出的第一批传教士到达伊犁^②，这是最早到新疆传教的天主教教会组织^③。光绪十三年（1887年），荷兰籍神父石天基和比利时籍神父梁明德在伊宁（宁远）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案查新疆教堂之设，实始于光绪十三年”^④。随后，霍尔果斯（绥定）、玛纳斯、乌鲁木齐（迪化）及呼图壁等地也相继建立天主教堂。圣母圣心会最初以伊犁地区的穆斯林群众为传教重点，因传教效果不理想，后来便转向在北疆地区的汉族和满族百姓中进行传教，“入教者无分（非）旗人汉人”^⑤。

由于新疆独特的民族构成，加上难以实施“土地换教民”的传教策略^⑥，圣母圣心会在新疆的教务发展非常缓慢，教徒数量始终没有太大增长。据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统计，玛纳斯天主

① 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年）》，《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第一批传教士共有三位，分别是戴格物（De Deken Constant）、杨广道（Jansen Andries）和石天基（Steeneman Jan - Baptist）。

③ 木拉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56，交涉四，天津博爱印书局，1923年，铅印本，第12页。

⑤ 马大正等主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70页。

⑥ 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年）》。

堂只有教徒“三十余人”^①，乌鲁木齐（迪化）天主堂只有“奉教男女八十三人”^②，伊宁（宁远）天主堂只有“奉教男女八十余人”^③。1922年，罗马教廷决定将新疆的教务活动交给德国圣言会接管。圣言会接管新疆教区后，教徒数量有了增长。据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调查，霍尔果斯（绥定）天主堂有教徒“男女各22人”^④，宁远天主堂有“男女教徒107人”^⑤，乌鲁木齐（迪化）天主教教徒人数达386人^⑥。天主教在新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最早到新疆的瑞典传教士是N. F. 豪伊杰尔（Horiger），他于1892年1月到达喀什^⑦。1894年2月，瑞典传教公会派出的第一批正式传教人员在拉尔斯·艾瑞克·豪格伯格（Rev Hogberg）的带领下也到达喀什^⑧，喀什成为瑞典传教团在新疆传教的“总据点”^⑨。随后，传教士在莎车、疏勒、疏附（即喀什噶尔汉城）、英吉莎等地先后设立传教点。到1938年，瑞典传教团在各传教点的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⑩。最早的基督教教堂建于光绪三十（1904年）年，是由瑞典传教团的七名传教士在喀什城北关建立的^⑪。传教团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传教对象，但在疏附也曾建立过一个传教点，并“在那里的汉族人中进行传教活动”^⑫。瑞典传教团的传教活动让“南疆七城都多少受到影响”^⑬。就信教人数而言，瑞典传教团的教务活动同样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真正“改信基督教的人很少”^⑭。在新疆传教的前25年间，瑞典传教团所发展的教徒“不超过30名”。后20年情况虽然有所好转，皈依的教徒“较多”，但也因此引起穆斯林群众的不满，认为传教士在维吾尔族中传播基督教，是“玷污了伊斯兰教，诱导维吾尔人走向了邪路”^⑮。

胡进洁（Gorge Hunter）是第一位到新疆传教的内地会教士。他于1906年3月27日到达乌鲁木齐，开辟了内地会在新疆的第一个传教点^⑯。从1906年到1938年，在新疆活动过的内地会传教士前后共有13位，主要为英、美籍传教士。他们曾在乌鲁木齐、玛纳斯、阿勒泰、塔城、伊犁的哈萨克、蒙古牧区以及南疆的阿克苏、喀什等地进行游历传教，其传教活动最终也失败了^⑰。

1938年初，盛世才开始驱逐传教士，将所有教堂及财产充公。传教士有的离开新疆，有的被

①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58，交涉6，第8页。

②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58，交涉6，第8页。

③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58，交涉6，第8页。

④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案1-2-361。

⑤ 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北京北堂遣使会包神父（J-M. Planchet）编：《中日传教》（les Mission de chine et du Japan. 北京，1925年，第106页。

⑦〔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崔延虎、郭颖杰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⑧〔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267页。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喀什：1989年，第160页。

⑩ 木拉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

⑪ 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56，交涉4，第12页。

⑫ 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王卫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0页。

⑭〔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1页。

⑮ 木拉提·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⑯ Mildred Cable,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Newington Gree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48, p.73. 盖群英、冯贵石：《新疆的圣徒——乔治·亨特》，内地会，伦敦，Newington Green, 1948年，第73页。

⑰ 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

盛世才逮捕。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告一段落。

二、传教士在新疆的慈善救助实践

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认为能让穆斯林改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最好途径就是“开设诊疗所、办学校、收养并教育儿童”^①。因此举办医疗服务、设立教会学校和开办孤儿院成为社会常态下传教士在新疆开展慈善救助的主要形式。

1. 举办医疗服务。医疗事业是教会在中国创办最早,对传教最有利的一项慈善事业。早在1834年美国派遣第一位传教士医生伯驾到中国活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要将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②,意图通过在民间开展医疗救助活动,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传教士到新疆后,以各传教点为依托,建立了附设于教堂的医院或诊疗所,开展医疗救助活动,以期在新疆人民面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传教活动服务。

1906年10月,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到莎车时,注意到莎车的瑞典传教站早已有医疗服务,既有药房也有病床。那里有“一个配备齐全的药房,当地居民付很少的药费就可以从药房拿到药品,那里有成套漂亮的、发着亮光的医疗器具,还备有常见病病人的免费病床”^③。他在喀什还参观了传教士赫伯特神父的诊所,看到“有37个病人在小小的院子里等着看病……在两个昏暗的房间里,躺着两个病人”^④。

传教士日常的医疗诊治工作非常繁重,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人。天主教的梁明德神父在每天十一时左右,“给有病的教徒或非教徒施诊施药,有时还到病人家中诊病”^⑤,并为他们接种牛痘^⑥。内地会的传教士郎道尼兹·美斯再尔(即马慕杰, Percy Mather),则“不分昼夜风雨,应诊一切病症”^⑦。他自己说:“这些天我工作的十分辛苦,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个小时,经常有病人在凌晨五点来看病”^⑧。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则对每天的病人数量之多进行了这样描述:“白天,我看到病人和残疾人蜂拥进入医院大门”^⑨。

由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尚不能较为准确地统计出有多少当地百姓接受过传教士的医疗服务,但据《中华归主》的记载,仅在1919年,“喀什噶尔、莎车、汉城(即疏附县)、英吉莎等地的小医院共收住院病人40多人。各诊所治疗病人达1.2万人,宣教医师共出诊860次”^⑩。瑞典教会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59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③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王家骥译,北京:中央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④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36页。

⑤ 吉六:《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3页。

⑥ 继鹿:《民初新疆大疫及当时医药卫生情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75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6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页。

⑧ Mildred Cable, Francesca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 Percy Mather of Central Asi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5, p. 110. 盖群英、冯贵石:《中亚的先驱——马慕杰》,伦敦, Hodder & Stoughton, 1935年,第110页。

⑨ [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5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第552页。

这样评价传教团在新疆的传教活动，说他们“最成功的活动是治病”，而且“这类活动每年有增无减”^①。

除开设医院外，传教士还对当地人员开展医疗培训。他们“采取措施培训当地人员从事医疗工作”^②，并在“当地（莎车）招收工作人员30名，主要是为当地百姓看病”^③。由他们培训出来的新疆早期的西医，“医术很高，深受人们尊重”^④。

传教士在新疆的医疗救助活动，给当地居民就医提供了极大帮助，缓解了居民无处看病的困难；他们将西方的医术、医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带到了新疆，对西医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2. 开办教会学校。开办教会学校是传教士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传教士到新疆后，在建立传教点的同时也陆续开办了教会学校。乌鲁木齐、伊犁、玛纳斯、喀什、莎车、疏附、英吉莎等地均有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新疆的教会学校只有小学，学制“从初小到高小”^⑤。宗教课程是教会学校的主课，由传教士讲授。此外，教会学校还配有汉文教师和维吾尔族教师。如疏勒县的教会学校有“四个瑞典老师，三个维族老师，一名汉族老师”^⑥。针对新疆穆斯林学生较多的情况，教会学校聘请毛拉为学生讲授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学生们可以在毛拉的指导下学习做一般的穆斯林祈祷”^⑦，这使新疆的教会学校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色彩。显然，这是为了适应新疆的实际情况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做法。

教会学校规模不一，学生人数差别很大。有的学校有学生“一百多名”^⑧，如疏勒的福音堂；有的学校只有学生16名^⑨，如疏附县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教徒子女、贫困家庭的子女以及教会收养的孤儿。教徒子女是教会学校的主要生源。伊犁地区有天主教传教士办的学校“好几所……但是入教会学校的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的孩子”^⑩。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是教会学校的重要生源之一。那些无力将孩子送到官办学校读书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那儿（教会学校）去上学”^⑪。因为在教会学校上学不仅“是免费的，同时还有各种津贴”^⑫。而入官办学堂学习，“总得有所花费”^⑬。因此，在伊犁的天主教学校中，除了教徒的孩子之外，学生“就几乎全是家境贫寒的人”^⑭。瑞典传教团的教会学校，也主要“召集汉回贫寒子弟”^⑮来学习。由教会收养的孤儿也集中在教会学校学习，“把流落民间的孤儿收集到福音堂学文化”^⑯。

① [瑞典] 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1页。

② [瑞典] 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268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0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页。

⑦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49页。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页。

⑨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1-2-361。

⑩ [俄]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4页。

⑪ [俄]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34页。

⑫ [俄]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34页。

⑬ [俄]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34页。

⑭ [俄]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34页。

⑮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1-2-745。

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0页。

教会学校注重为新疆的女童提供上学机会。近代,新疆官办学校和伊斯兰经文学校都不招收女童入学,“所有这些(学堂)都是对男孩而言的。至于谈到女孩子,那么她们非但无一例外地受不到教育,而且都是文盲。没有官立女子学堂”^①。这种“不招女童入学”的状况在教会学校得到改变。玛纳斯天主教学校最初就是专门针对女童设立的,“查属县东头工设有女学堂一所,亦系天主堂分设于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成立”^②。民国五年(1916年),疏附县瑞典教会学校已招收女生8名^③。疏勒县瑞典教会学校,由于女生人数比较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女生班^④。

教会学校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孤儿和女童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和场所,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这既反映了教会学校所强调的上帝赋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也使教会学校的公益性质更为明显。

3. 开设孤儿院。设立孤儿院也是传教士宗教慈善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传教士在新疆设立孤儿院的记述并不多,但据记载,1920年时,莎车已有传教士设立的孤儿院一所,并已经“收容了12个回族儿童”。当时,还正在准备“筹划建设一个更大的孤儿院收容所”^⑤。到1933年时,莎车的孤儿院已增至两所,男女孤儿院各一所,每所孤儿院均有专人负责管理^⑥,收留的孤儿人数已经达到了100名^⑦。这两所孤儿院一直保留到1938年^⑧。

三、宗教慈善救助与新疆社会的相互影响

天主教、基督教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客观上对新疆社会救助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半个世纪的传教过程中,传教士将西方的近代救助理念传入新疆,使新疆的社会救助理念呈现出近代化趋势;受新疆特殊的人文、历史条件的影响,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救助在这一过程中也呈现出世俗化趋势。

1. 救济理念上的近代化趋势。传统的社会救助活动以“养”为主,主要限于“施”,极少注重对救助者谋生技能的培养。受西方近代救助理念影响,传教士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开始注重对受助者个人能力的培养,使新疆的救助活动呈现出“施教并重”的趋势。

“施予”是社会救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施予”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上极度贫穷和处于弱势的人群,如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与传统救助不同的是,传教士“施予”的对象已由传统的施予对象扩大至社会大众。在教会医院,“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医院同样都给他们治病。来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被拒绝”^⑨。对于教徒,“施予”对象的大众化更加明显,“男女老少不分民族贫富……看病不要钱”^⑩。在教会学校里,一律实行的是免费入学。这些现象表明面向大众的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等蕴含近代社会救助理念的内容已在新疆社会初步显现。

①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29页。

②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1-2-930。

③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1-2-361。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第552页。

⑥ 木提拉·黑尼亚提:《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页。

⑧ 新疆档案馆政治档2-5-140,转引自木提拉·黑尼亚提:《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

⑨ [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4页。

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玛纳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玛纳斯文史资料》(第2辑),石河子:石河子印刷厂,1986年,第68页。

在“施予”的同时，传教士注重对受助者个人谋生技能的培训。教会学校中有专门的工艺学习场所，用来培训学生的谋生技能，以达到使受助者最终能够自立的目的。瑞典传教团在莎车开办了职业学校，该学校“有男生八人，女生七人，均授以有用的职业”^①。他们“专门学习医术和毛纺织技术”^②。传教士对医务人员的培训，使实际的受益者由个人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是一种面向整个社会层面的“造血型”救助，对新疆社会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

可见，传教士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活动蕴含了“施教并重”的近代救助理念，这种“施教并重”的理念迥然有别于新疆官办社会救助机构以“养”为主的救助理念^③，新疆社会救助出现了由“重养轻教”向“施教并重”转化的趋势。传教士开展的宗教慈善救助是“施教并重”理念在新疆社会救助中的具体实施，为新疆传统社会救助注入了近代化色彩。当然，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社会救助的近代化趋势要弱一些。

2. 宗教救助的世俗化趋势。传教士在中国举办慈善事业的真正目的在于引人入教，“慈善事业应以能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④。进入20世纪之后，慈善事业更是“必须以信教为条件”^⑤。在新疆，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烈抵制，传教工作十分不顺，“在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中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一直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在劝说人们改信基督教方面，效果很差”^⑥。如果坚持以信教为前提，传教士根本无法在新疆立足。迫于情势，传教士们只能放弃以“信教”作为慈善救助的前提，而将“努力主要集中在了医疗保健和教育上”^⑦。

许多传教士同时兼有教士和医生的双重身份，“他们都是职业医生”^⑧，这两种身份角色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作为传教士，他们应履行传播基督福音的职责，但作为医生，他们又必须面对病人的肉体痛苦。因此，尽管面临的现实是“没有一个穆斯林愿意来受洗礼的”^⑨，但传教士们“仍然耐心地工作着”^⑩，坚持“为维吾尔穆斯林看病已经好长时间了”^⑪。显然，这种做法与传播基督福音的“教士”身份有一定差距，但与“医生”身份却是相符的。对新疆民众而言，他们认同的是传教士“医生”身份，而非“教士”身份。从“医生”身份看，传教士受到百姓的普遍尊敬。“我很高兴地看到，富有同情心的博士与他的可爱的夫人是如何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尊敬的，他们成群结队地送来的补品堆成了小山，都是水果和糖块。”^⑫教会医院也“声名远扬”^⑬。从“教士”身份看，传教士被百姓诅咒为“宗教贼”^⑭，“当地人中不时地对他们有一股仇视的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第552页。

② 新疆档案馆外事档1-2-362。

③ 何荣：《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④ 《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1899年，第47页，转引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⑤ 《美国与加拿大基督教差会会议记录》，1899年，第47页，转引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79页。

⑥ [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1页。

⑦ [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1页。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第552页。

⑨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36页。

⑩ 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第40页。

⑪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36页。

⑫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95页。

⑬ [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4页。

⑭ [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第73页。

情”^①，传教团也受到袭击^②。显然，新疆民众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医院，并非天主教或基督教。

在教会学校里，教士们除了给学生们讲授宗教知识外，还要担负起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是由他们负责”^③。同时，教会学校“也向他们（学生）提供非宗教教育”的智育课程，这些课程包括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④以及“自然”^⑤。传教士还通过教唱宗教歌曲的方式，让学生们接触到西方的音乐，“教师在教室摆一架脚踏钢琴……先用钢琴弹出曲调，学生跟着调子唱经歌”^⑥。教会学校出现了近代学校注重德育、智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趋势。对于学生家长而言，他们不仅自己对天主教或基督教“并不热心”，同时也“害怕孩子们在那儿信仰起基督教”^⑦，真正能吸引百姓的并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而是教会学校提供的免费上学机会。

可见，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活动最初是为了传教，但在新疆实际的传教过程中，其作用和影响却早已超越了宗教本身的范畴，带有更多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促使传教士的宗教慈善向近代社会公益事业逐步转化。这种转化一方面是由于新疆社会本身对天主教、基督教强烈地抵制，使传教士们难以通过宗教慈善达到传教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医疗事业、教育事业自身专业化发展的趋势所致。

宗教慈善活动是西方传教士在新疆传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西方传教士宗教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如何评价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时，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认为传教士是殖民主义势力的一部分^⑧；二是认为传教士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与使者的角色^⑨。这两种倾向都侧重探讨传教士对新疆社会的单向影响，很少论及新疆社会本身对传教士活动的影响。

从社会救助的角度看，传教士与新疆社会的影响应是相互的、双向的。一方面，由于新疆社会救助的不健全，为传教士在新疆的宗教慈善救助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传教士将西方的近代救济理念传入新疆，使新疆的救济理念呈现出近代化趋势，推动了新疆社会救助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受新疆特殊人文、历史条件的影响，传教士慈善救助的宗教色彩日渐淡化，呈现出世俗化趋势，推动了传教士宗教慈善救助向社会公益事业的转化。这种相互的、双向的影响在客观上对近代新疆社会救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当然，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传教士的所有宗教慈善活动都是围绕着传教这一目的展开的，也是为了传教这一目的服务的。这些宗教慈善活动是“一种间接的传道方式，与宣讲等直接传道相比，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⑩。因此，我们在评价传教士的宗教慈善救助时，不能将主观上的传教目的与客观上产生的影响割裂开来，否则，将会使问题的讨论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陈霞

① 凯瑟琳·马噶特尼：《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第40页。

② 转引自木提拉·黑尼亚提：《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③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34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0页。

⑤ 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47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喀什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喀什市文史资料》（第4辑），第160页。

⑦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234页。

⑧ 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⑨ 周轩、崔延虎：《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⑩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87页。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的慈善救助活动

作者: [何荣, He Rong](#)
 作者单位: [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3](#)
 刊名: [新疆社会科学 \(汉文版\)](#) CSSCI
 英文刊名: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年, 卷(期): 2009, "" (6)
 被引用次数: 0次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Mulati Heiniyati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世界宗教研究2005, "" \(1\)](#)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 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 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 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 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2. 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近代西方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 -西域研究2001, "" \(4\)](#)

本文考察了近代西方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情况, 文中根据外文和中文档案资料对内地会乌鲁木齐传教点的创办时间、“瑞华内地会”与瑞典传教团的区别、新疆内地会传教士的人数和往来情况、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圣经》的翻译和印刷以及内地会的活动性质等进行了辨析。

3. 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 -西域研究2003, "" \(4\)](#)

本文主要研究了20世纪初内地会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经历、他们的往来途径和在南北疆的传教活动情况, 并根据外文史料和中文档案的对比, 勘同了传教士的中外文姓名。

4. 期刊论文 [郭益海, GUO Yihai 近代新疆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传教活动评述—兼评《中亚的先驱—马慕杰》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6 \(4\)](#)

文章依据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有关传记资料对中国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在中国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情况以及少数民族基督教宣传册和《蒙英词典》等编译情况作了首次比较全面的概述, 对在中国新疆的内地会传教士的传教时间、经历做了一些新的界定, 并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认为他们既有西方文化传播者的身份特征, 同时又是符合西方殖民势力利益的一部分。

5. 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 -西域研究2002, "" \(3\)](#)

本文研究了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圣言会传教士在北疆地区的活动历史, 依据外事档案资料和外文史料, 对伊宁、霍尔果斯、呼图壁、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天主堂的建立、发展及对各教堂的历任堂主、传教士到堂时间、教堂学校、医院、教堂地产和纳税情况作了考释, 并对传教士因霸占土地而与当地人民和政府发生的冲突进行了分析。

6. 期刊论文 [尹万才, Yin Wancai 近代新疆的基督教文教医药活动探析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11 (6)

近代以来, 外国传教士在新疆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 创办了一些文化教育事业和医药事业, 以此作为促进传教事业发展的助推剂。虽然传教士创办文教医药事业的目的是借以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 但在客观上也对新疆地区文教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7. 期刊论文 [木拉提·黑尼亚提 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 -新疆社会科学2002, "" \(3\)](#)

1840年鸦片战争后, 西方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内地, 传播“上帝的福音”。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典虽未参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 但瑞典教会却利用了由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的条约开拓的这条道路, 也派遣了他们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与整个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背景有其共同的一面。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始于19世纪中叶, 80年代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派遣传教士来华的高潮。喀什噶尔传教团是瑞典教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这些传教士在喀什、莎车、疏附、疏勒和英吉沙等地建立了教堂, 本文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传教团的建堂历史进行了以下考察。

8. 期刊论文 [张娟, 陈四海 康熙皇帝与古钢琴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5 \(4\)](#)

古钢琴是一种欧洲乐器, 明万历传入我国, 但受到“宠爱”却是在康熙时。文章从康熙学习钢琴的初衷入手, 并论述了康熙学习古钢琴的意义, 以及组建西洋乐队等几个问题, 探讨了康熙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其局限性。

9. 期刊论文 [郭换平, 龙开义, GUO Huan-ping, LONG Kai-yi 近代以来新疆基督教研究综述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9, 25 (5)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之地, 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主要开始于近代。对于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发展状况, 很多学者都做过专门的研究。主要从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传教士在新疆的活动、目前基督教在新疆的分布以及传播等三个方面对以往学者的研究加以梳理, 以期对未来的新疆基督教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0. 期刊论文 [从外国人游记中看近现代英俄两国在新疆喀什地区的角逐 -黑龙江史志2009, "" \(22\)](#)

喀什, 位于祖国边疆的西陲, 因为它在新疆南部及整个中亚地区的重要地位, 近代成为“探险家”、“考古学家”、“商人”、“传教士”等“必经”之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写下了考察报告或亲身经历的游记、回忆录,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当时英俄两国对新疆喀什地区的侵略活动。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jshkx20090602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2b344c4-e853-4667-9352-9e4d0070347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